

“全球城市”极化与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研究

李志刚¹, 吴缚龙², 高向东³

(1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2 卡的夫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
英国, CF10 3WA 3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062)

摘要: 采用 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当前趋势进行探讨, 结合中国崛起的历史性、地域性, 针对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 对全球化下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向进行分析, 发现上海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出现社会空间极化。通过对社会空间因子空间分布的实证分析, 进一步揭示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尚不明显。

关键词: 城市社会空间分异; 全球城市; 极化; 上海

中图分类号: F11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7)03-0304-08

1 “全球城市”极化之辩

社会极化及其对城市空间影响是当代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1,2]。当前西方城市正处于后福特主义 (Post-Fordism) 转型期, 更具流动性的生产劳动模式带来新的管理和控制手段^[3]。经济国际化和信息技术的成熟发展、以及资本与劳动流变动的加剧等原因促成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在产业结构上, 一方面是工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造成西方城市普遍“去工业化”, 另一方面是“生产者服务业 (生产性服务业)” (商业、银行、传媒、金融等) 在“全球城市”集聚以发挥全球性的管理控制功能^[4-6]。“世界城市”假说指出, 资本运作的矛盾将突出表现在世界城市^[7]; 萨森 (Sassen)^[1] 则指出“全球城市” (Global City) 纽约、伦敦和东京正出现社会极化。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精英人才集聚, 工业、制造业紧缩, 服务业增长; 日益增加的国际移民为城市低技术、低工资的服务业发展提供劳动力; 社会结构的两端膨胀而中间段减小。弗里德曼和萨森认为社会极化将带来空间极化, 城市居住空间随之变得“分化”、“碎化”^[8]。

萨森认为, 极化的社会空间将不仅在全球城市

存在, 而且将出现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其他级别的城市。这一假设颇具争论, 由此引来诸多论战。例如, 通过研究英国伦敦和荷兰兰斯塔德 (Randstad) 地区的职业变化, 汉姆莱特 (Chris Hammett)^[2] 指出欧洲福利国家的城市社会分化并非极化而是职业化 (Professionalisation), 社会结构表现为两头小, 中间大。他把萨森的研究结果归因于美国城市特殊的发展元素——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但是, 伯格 (Burgers)^[9] 对汉姆莱特所用数据进行再分析, 发现如果将郊区数据记入, 其结果仍是极化。对这一假设的检验扩展到其他全球城市: 巴姆 (Baum) 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其分异表现为职业化, 而瓦塞尔 (Wessel) 对奥斯陆的研究则发现由于政府福利机制的影响, 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没有增加。希尔 (Hill) 和金 (Kin)^[10] 认为全球城市极化假说不适于东亚“发展型国家”。他们指出, 尽管同样处于后工业化期间, 制造业的减少、“生产者服务业”、国际移民增加、社会构成极化、城市空间的恶性区隔等并未出现在东京和汉城。他们将此归因于韩国和日本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作为应答, 弗里德曼指出“世界城市”假设不排除区域差异, 并强调“世界城市”理论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分析空间差异性。而萨森则承认东京和汉城

收稿日期: 2006-07-25 修订日期: 2007-05-05

基金项目: 英国科学院 Socio-spatial segregation and neighbourhood change in urban China 基金项目 (批准号: SG-33836)、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 UCRN (Urban China Research Network) Small Grant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0471039 40601033)、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06300105)、中山大学“百人计划”项目 (3171310) 资助。

作者简介: 李志刚 (1976-), 男, 湖北天门人,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空间结构。Email: lizh@mail.sysu.edu.cn

的特殊性,但她批评希尔和金分析中的数据问题。总体上,在全球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分析中,全球化之外其他要素的影响在不断被重视。

2 上海的社会分异

中国城市处于完全不同于西方城市的政治经济背景之下。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高速和巨大规模可谓史无前例,市场改革、全球化和民工潮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产生巨大冲击^[11]。中国城市 20 年来的飞速扩展为解读全球城市假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正构成庞大研究群体的同时^[12],对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研究在地理学领域也正不断展开^[13-14]。根据冯健和周一星教授的综述^[15],国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从 1980 年代后期开始即已涉猎,例如虞蔚对上海社会空间的定性分析^[16],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方法对广州社会区的划分等^[17]。进入 90 年代,尤其 1996 年左右,随着数据采集和获得的优化,新的研究不断涌现出来,例如 1995 年郑静等对广州社会区的再分析^[18],柴彦威对兰州市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析^[19]。特别是 1997 年顾朝林教授等对北京产业转型和社会极化的探讨,表明国内研究者的视野在不断拓展^[20]。进入 2000 年,社会空间分异结构的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的热点,吴启焰对南京的居住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研究^[21-22],冯健等采用因子生态法对北京 1982~2000 年间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23]。

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到来,例如城市跨国公司职员阶层^[24]和农民工在劳动力市

场、收入、住房上两极地位的凸现^[25],城市郊区别墅区的出现^[26],浙江村、新疆村、“城中村”等外来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出现^[27-28],新城市贫困在特定城市地域的显现,社会空间的分化已经成为当今城市居民日常体验的城市印象。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证价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将成为对全球城市转型的呼应,成为对自由市场经济下的西方全球城市研究的补充与对照。据此,本文对上海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型展开研究。

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一级城市或者用以指代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各级城市,这些城市在这一角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功能”^[7]。“全球城市”或“世界城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区域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全球城市^[29-34]。上海的飞速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城市、区域乃至国家腾飞的决心,APEC 世博会等大型事件的开展,都是将上海建设为全球城市的努力的写照。

上海的崛起伴随着城市社会经济规模性的结构重构,城市社会和社会空间亦处于转型之中。首先,就上海的职业构成变化而言,对比 1990 年和 2000 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普查统计的总人口增长了近 30%。值得注意的是,两次统计总的就业人口数目变化不大,仅有 0.7% 的增加。根据职业划分,7 类职业构成中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减少了近 12%。而最为明显的增加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类型上,分别增加了近 7% (表 1)。

表 1 上海职业构成的变化 (1990~2000)

Table 1 The changing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Shanghai 1990—2000

	1990		2000		1990~2000 变化	
	数量 (百人)	%	数量 (百人)	%	数量 (百人)	%
总人口	128340		164077		35737	27.8
就业人口	80585		81151		566	0.7
外来人口	17800		38700		20900	17.42
	数量 (千人)		数量 (千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075.23	13.14	1039.63	12.81	-35.60	-0.3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95.70	3.67	277.24	3.41	-18.46	-0.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65.06	5.77	959.07	11.81	494.01	6.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23.28	15.17	1821.01	22.44	597.73	7.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4068.46	50.49	3100.01	38.2	-968.45	-12.3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929.07	11.53	917.09	11.3	-11.98	-0.2
其他劳动者	1.70	0.02	1.08	0.01	-0.62	0.0

数据来源:第 4 次人口普查报告,第 5 次人口普查报告

随着产业升级,职业构成表现为明显的向后工业化转型的特征: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减少,生产者服务业增加,这和全球城市假说在职业构成的论断基本一致。但是,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年的职业构成和1990年的职业构成差别存在但还不是很大,工业、制造业群体比例在减少,但仍然占绝大多数,服务业等的比例增加了,但还不是占最大多数,这表明城市处于向后工业转型的初期,尽管第三产业的产值在2000年已经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在职业构成上还存在很大调整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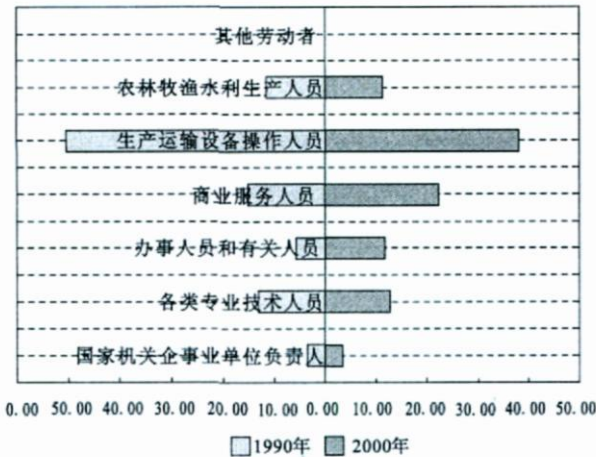


图1 上海的职业构成(1990-2000)(%)

Fig 1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Shanghai(1990-2000)

另一方面,总体而言,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1990到2000年间10年来差距逐步加大(表

2),前10%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量已经达到后10%者的2倍左右,而且前10%收入水平的居民的收入份额10年来增加了6%,而后10%收入水平者的总份额减少了近2%。如果考虑农民工等外来人口的低收入水平,居民在收入构成上的逐步分层将更为显化。进一步分析具体的行业收入构成(表3),可以看出不同行业收入构成已表现为明显的分化,横向比较而言,集体单位各行业的工资水平低于国有单位和其他行业,而尤以外资企业的收入水平最高。纵向比较而言,农业和公共服务业的收入水平最低,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经济,管理型职业:金融,保险,信息咨询业等的收入水平最高。这表明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不同职业构成的人群在收入水平上正日益拉开差距。

表2 上海市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Table 2 Income in Shanghai

年	前10%居民收入: 后10%收入总量		前10%收入总量	
	后10%居民收入	占全部总量比例	占全部总量比例	占全部总量比例
1990	2.47	8.86%	21.89%	
1991	2.72	8.43%	22.98%	
1992	2.82	8.15%	23.02%	
1993	3.24	7.53%	24.42%	
1994	3.90	6.92%	26.96%	
1995	3.94	6.73%	26.56%	
1996	3.90	6.82%	26.62%	
1997	3.92	6.65%	26.05%	
1998	3.98	6.56%	26.10%	
1999	4.25	6.97%	29.63%	
2000	3.88	7.16%	27.82%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1

表3 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水平(2001)

Table 3 Income of people working in different employment sectors

	职工平均工资(元)				
	合计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其中:港澳台和外资
农、林、牧、渔	11521	11577	13663	9404	11923
工业	15440	13230	5778	19916	22692
建筑业	16270	16865	11919	16689	17854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	19988	19924	—	23439	—
商业经纪与代理业	32765	22421	23472	37003	37511
金融、保险业	34654	31084	19860	39016	67695
房地产业	22944	21754	17585	25178	32483
服务业	15043	15025	9270	16736	24870
公共服务业	14323	15302	11861	12365	14715
信息、咨询服务业	24548	12380	20785	43951	53237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2001

3 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异

采用五普数据分析上海的社会空间结构。研

究范围包括上海中心区和外围郊区在内的全部行政范围。由于数据限制,研究采用的三项指标仅包括职业所属的三次产业类型,农民工(外来人口)

和教育水平。首先,职业构成的转变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而劳动力的分化对收入住房等的影响无疑又将反应在不同产业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上;其次,移民因子是当前西方城市(国际移民)和我国(外来人口)城市共同面对的最大外加压力,这一因子在全球城市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由于居民收入数据一般不在人口普查中涉及,考虑我国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存在基本的正向联系,因此我们选用教育水平因子。

为比较不同性质居民在空间分布上集聚度,测量各基本空间单元(指街道)的地点指数(也译作“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34]。其公式为:

$$LQ = (Q_i / \sum_{i=1}^n Q_i) / (P_i / \sum_{i=1}^n P_i)$$

其中,是指代统计数据上的街道单元, Q_i 指的是具有特定职业,性质的居民,而 P_i 指的是总的居民数量。 $LQ < 1$ 表征的是特定地区的特征人群其集聚度地域城市理想均质情况的水平,而 $LQ > 1$ 则代表了在特定空间上比较高的集聚度。这里我们采取的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空间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与因子生态分析的差异在于后者采用数据压缩的多元统计方法将多个变量简化为较少变量,且能减少相关因子间的相关影响。但是,由于普查数据本身的局限性,对城市社会区的划分其实仅仅反映了从普查数据中所能选取因子的最大解释力,这也是当前因子生态分析的结果总是停留在一定社会经济属性教育,职业,或种族等因子的原因。因此,我们采取对这些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因子直接进行分析的方法,得到的结果与采用因子生态分析得到的空间结构类似。

第三产业从业居民明显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图2),由中心区向郊区其集聚呈逐步衰减的趋势。同时,在远郊区由零星的高集聚度区域存在。就中心区而言,沿延安中路、延安西路沿线的街道的 LQ 值均高于 1.5 如长宁区的程家桥、仙霞、虹桥;徐汇区的湖南路、天平路、枫林路;整个静安区、黄浦区 and 卢湾区的大部分街道等,表明了这一地区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上的强集聚度。上海中心区更新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商业中心在传统城市节点地域的改造发展^[35],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等地段作为历史上的第三产业集聚地,当然地升级为全市、区域、乃至全国地产业中心。这样,城市空间的在中心区的产业重构对当地居民职业构成

的影响可见一斑。同时,远郊区也存在第三产业人口的集聚,图2中可以看到远郊区的青浦镇、松江区、南桥镇、嘉定镇等都具有较大的 LQ 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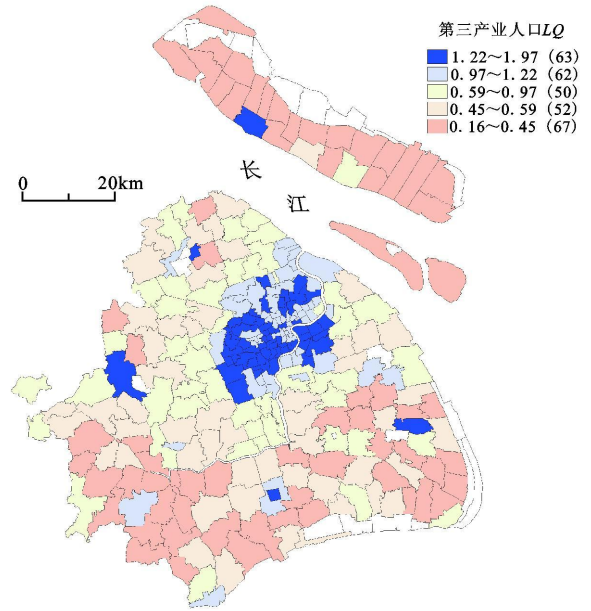


图2 第三产业居民

Fig. 2 Location Quotient for residents working in the tertiary sectors

其次,就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而言,从业人口的空间分布反映出郊区分散化的趋势(图3)。传统的工业用地在上海地发展表现为产业用地在中心区与居住区的混杂。1990年以前,上海的工业用地主要集中于中心区,其总量是近郊区的4倍。90年代地产业重构“退二进三”带来了工业用地的郊区化转移,松江、康桥、嘉定、莘庄、奉浦、金山嘴、宝山、青浦、崇明等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区在近郊区发展起来。同时,宝山、嘉定、松江、金山、闵行、青浦、南桥、惠南、城桥及空港新城和海港新城等11个新城处于规划发展中。新城均具有显著工业职能:例如宝山以冶金、港口为特色,嘉定以科技产业为主体,金山以石油化工为主体,闵行具有大型机电制造和航天工业,空港以航空产业、综合贸易、出口加工为特色等。这样,到1996年,只有23%的工业用的还残留在中心区,中心区的居民中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但在近郊区和远郊区,也存在大量分散集聚的第二产业人口,这是因为乡村工业和村镇工业的发展并行于中心区的产业外溢。其结果是当前上海27%的用地是工业用地(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15%),且工业用地的

44%是分散分布在集中开发区用地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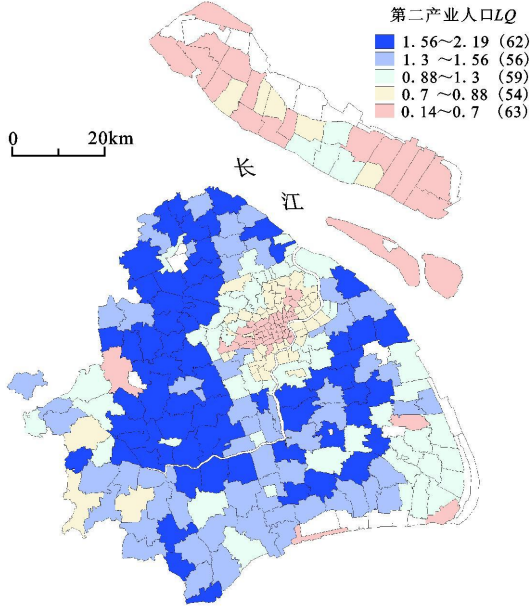


图 3 第二产业居民

Fig 3 Location Quotient for residents working in the secondary sectors

第三, 农业就业居民的集中趋势表现为在近郊区和远郊区簇状分布(图 4)。最高的 IQ 指数出现在青浦的大盈镇、嘉定的曹王镇、封滨镇和闵行的杜行镇。同时在松江的天马镇和仓桥镇一带有多个街道 IQ 值高于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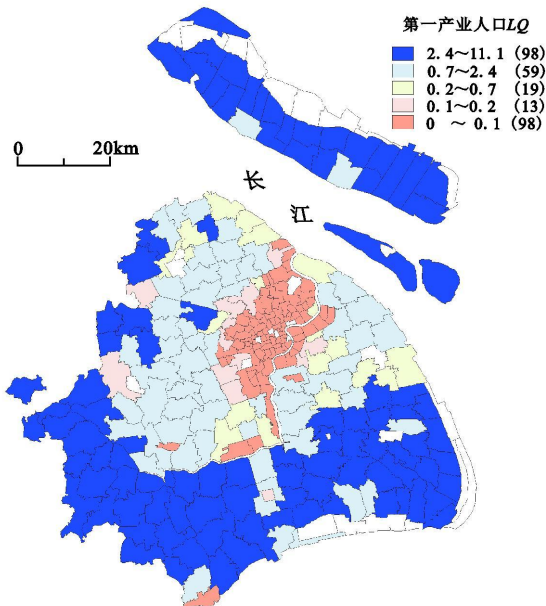


图 4 第一产业居民

Fig 4 Location Quotient for residents working in the first sect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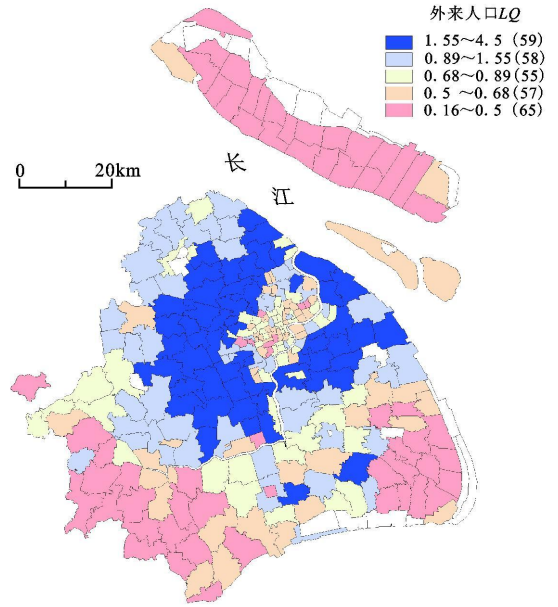


图 5 外来人口

Fig 5 LQ for migrants

4 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异

城市发展对生产资本的利用和对低端服务型劳动力的需求都通过“移民”(migrant)因子得到满足。移民因此是对城市产业重构和社会空间重组的最大外力因素。图 5 表明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倒 U 字型: 在远郊区和中心区其 IQ 指数小于 1, 而在近郊区形成环状集聚带。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大量外来人口居住在中心区和内郊区带。但随着城市改造的进程, 因为近郊区住房租赁费用地相对低廉^[36 37], 与工作地如工业区等地接近, 城市中心区的可达性等, 90 年代上海移民的集聚地转为近郊区。嘉定、闵行、青浦、松江和浦东地金桥, 张江地区集中了最高 IQ 指数地外来人口。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嘉定区的外来人口占全市外来外来人口总量的 47.4%。这表明了移民居住地分布与就业地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 从职业构成看, 五普数据统计表明外来人口在上海主要从事制造加工和建筑施工、商业和餐饮以及居民生活服务、农林牧业等。最高比例的外来人口职业分布在制造加工业, 占 25.8%, 而建筑业的外来人口就业比例也达到近 20%, 这表明了了在第二产业外来人口的高度集聚。

5 不同教育水平人口的空间分异

教育水平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指代, 对于

知识经济的重视使城市居民接受教育的回报率处于相比以往更高的水平,因此不同教育水平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大致反应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群在城市空间上的分异。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仅选取宝山和浦东两个近郊区与中心区来进行分析。图6表现为明显的中心区与郊区在不同教育水平人口上的差异,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群在中心区,特别是静安、徐汇、长宁和中心区北部的闸北,杨浦等区域有较高的IQ值,而郊区地域根据‘距离-增强’的规律有较高集聚度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但是,应该看到,相应的地点指数在这两个因子上的数值都比较小,均低于0.5的水平,这说明不同教

育水平居民在城市空间上并不存在很大的分异趋势,仅表现为在特定地域的相对集聚。同时,图中IQ的分布表明,高IQ值的地点一般是位于高校,研究所等比较集中的地段,这说明尽管住房已经不再由单位分配,但单位地点对于特定人群的地域分布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中心区的某些地段,如闸北的天目西路、宝山路、虹口的嘉兴路,杨浦的平凉路以及黄埔的董家渡、小东门等街道具有相对高集聚度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可能的解释是老龄化以及城市改造发展的选择性,这些地区的人群构成相对中心区的其他地区在这一方面要突出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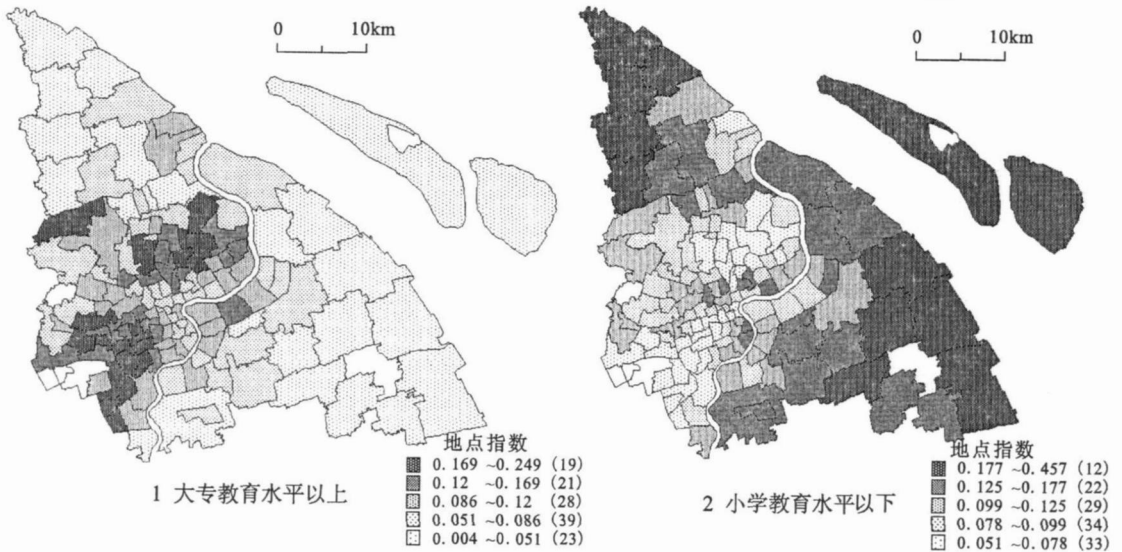


图6 教育水平

Fig 6 Location Quotient for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6 结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政治经济背景下,上海的社会空间转型并不单一由全球化因素决定。相反,上海的社会空间转型反映出自身的诸多特点。例如,郊区和城市中心区在不同社会层次人群分布上的对立是福特制下西方城市最为典型的特征,但上海工业和居住的郊区化并未表现出郊区与中心区在社会空间上的巨大差异,外来人口在近郊区的集聚更多的表现为与工作地的临近性,上海并未出现中产阶级型的郊区等等。同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响在社会空间上的影响仍然通过单位和居住的紧密联系体现出来,例如外来人口在工业区周围集聚居住,具有较高等教育水

平的居民在大学、科研机构集中的地段高度集聚等。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经济转型的大背景更增加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作为结果,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和工业的不断升级将使中国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承担重要作用。是否中国全球城市重构将与西方目前的全球城市发展规律一致?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未来中国全球城市的功能特征,取决于其在全球体系上将具有何种职能。

参考文献:

[1] Sassen S. The global city. Princeton [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Hamnett C. Social polarizatio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welfare state regimes [A]. SMusterd, W Ostendorf. Urban Segreg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 [C]. London: Routledge. 1998. 15

—27

- [3] MaYer M. PostFordist City Politics [A]. In: A Am in Post Fordism: A Reader [C]. Oxford: Blackwell, 1995. 316—337.
- [4] Castells M. The Informational City [M]. Oxford: Blackwell, 1989.
- [5] Mollenkopf J. M. Castells' Dual City: Restructuring New York [M].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1.
- [6] Knox P. S. Pinch.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Prentice Hall, 2000.
- [7] Friedmann 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J]. Development and change, 1986, 17: 69—83.
- [8] Marcuse P. Dual city: a muddy metaphor for a quartered cit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1989, 13(4): 697—708.
- [9] Burgers J. No Polarisation in Dutch cities: Inequality in a corporatist country [J]. Urban Studies, 1996, 33(1): 99—105.
- [10] Hill G. C. JW Kim. Glob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states: New York, Tokyo and Seoul [J]. Urban Studies, 2000, 37(12): 2167—2195.
- [11] Logan J. R.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 [12] Nee V.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9, 54: 663—681.
- [13] Ma L. J. C.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1949—2000: a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2, 34(9): 1545—69.
- [14] 顾朝林, 徐海贤.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进展 [J]. 地理科学, 1999, 19(4): 319—330.
- [15] 冯 健, 周一星.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J]. 地理科学进展, 2001, 22(3): 304—314.
- [16] 虞 蔚. 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与规划 [J]. 城市规划, 1986, 10(6): 25—28.
- [17] 许学强. 广州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因子生态分析 [J]. 地理学报, 1989, 44(4): 386—395.
- [18] 郑 静. 广州市社会空间的因子生态再分析 [J]. 地理研究, 1995, 14(2): 15—26.
- [19] 柴彦威. 以单位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内部生活空间结构——兰州市的实证研究 [J]. 地理研究, 1996, 15(1): 30—38.
- [20] 顾朝林, 克斯特洛德. 北京社会极化与空间分异研究 [J]. 地理学报, 1997, 52(5): 385—393.
- [21] 吴启焰, 任东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地域结构演变与持续发展研究——以南京都市区为例 [J]. 地理科学, 1999, 19(2): 108—113.
- [22] 吴启焰. 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23] 冯 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 [J].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483.
- [24] 熊世伟, 葛越峰. 跨国公司在上海的区位行为及其空间影响 [J]. 地理科学, 2000, 20(3): 229—235.
- [25] 陈 浮, 葛小平, 陈 刚, 等. 城市边缘区景观变化与人为影响的空间分异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1, 21(3): 210—216.
- [26] 周一星. 北京的郊区化及引发的思考 [J]. 地理科学, 1996, 16(3): 198—206.
- [27] 刘海泳, 顾朝林. 北京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功能 [J]. 地理科学, 1999, 19(6): 497—503.
- [28] 田剑平, 许学强, 赵晓斌, 等. 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 [J]. 地理科学, 2002, 22(4): 476—482.
- [29] Yusuf S. W. Wu. Pathway to a world city: Shanghai rising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J]. Urban Studies, 2002, 39(7): 1213—1240.
- [30] 李国平, 卢明华.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模式与政策导向的初步研究 [J]. 地理科学, 2002, 22(3): 263—269.
- [31] Wu F. Place promotion in Shanghai, PRC [J]. Cities, 2000, 17: 349—361.
- [32] 上海市统计局. 上海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 [33] Wu F. Globalization, place promo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J].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03, 25(1): 55—78.
- [34] Walks R. The social ecology of the post-Fordist global cit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o-spatial polarisation in the Toronto urban region [J]. Urban Studies, 2001, 38(3): 407—447.
- [35] Gaubatz P. China's urban transformation: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morphological change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J]. Urban Studies, 1999, 36(9): 1495—1521.
- [36] Fan J. W. Taulman. Migrant enclaves in Chinese large cities [A]. In: J. R. Logan.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183—197.
- [37] Gu C. L. H. Y. Liu. Social polarization and segregation in Beijing [A]. In: J. R. Logan. The New Chinese City: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 Reform [C].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1. 198—211.

Polarization of the Global City and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Shanghai

LI Zhi-Gang¹ WU Fu-Long² GAO Xiang-Dong³

(1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2 Cardiff University United Kingdom CF10 3WA

3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of Post-Fordist cities, especially the ‘global cities’, has undergone a decade of intensive debates. It is debatable that whether the socio-spatial polarization in global cities will be paradigmatic to other globalizing cities on lower level of the global city hierarchy. It is argued that social stratification under market-oriented reform in urban China is producing a new urban space. Therefo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merging socio-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hanghai, one of the most globalizing cities of transitional urban China. Using data of the 5th national census, this study finds out important evidence of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n the sub-district level in terms of attributes of employment sectors such as primary sector, secondary sector, and service sector, as well as migrant status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However, no social polarization is found. Although the social structure is largely stratified along the lines of global cities, Shanghai at this stage did not present evident tendency of polarization. No severe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s identified. The reason is attributed to the specific developmental status of Shanghai, it is at the preliminary stage of post-industrialization. In addition, it is found that social legacy has largely kept in effect in Shanghai, as workers still live near to their working places, especially intellectuals. It indicates that historical legacy in the socialist era is still shaping socio-spatial structure. The impact of the state is also highlighted. As a state project, Shanghai is restructured by poli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Just as Tokyo and Seoul, Shanghai also shows the ambitious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o mould a domestic city to the global status. It is argued that the global city debate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different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Key words: Socio-spatial differentiation, global cities, polarization, Shanghai